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汉葡词典抄本及其史料价值

杨慧玲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12)04-0118-02

关于近世以来语言学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傅斯年先生有过这样的表述“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是一个大题目。”通过语言材料考察历史之变迁,这是治史学的一个重要方法,由此发现并应用新的语言材料亦是推进历史研究的新方法。

西人东来后,明清之际以耶稣会士为首的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与明清士人官员交往密切,一些由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合作的中文著述和译著被载入《四库全书总目》。然而,作为入华耶稣会士学习汉语的著作——双语词典和汉语语法书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早期由欧洲人和中国助手共同完成的汉外双语词典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们不仅仅是中国辞典史乃至世界双语辞典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1933年,裴化行神父(Henry Bernard S. J., 1889-1975)和布兰德神父(Van der Brand, C. M.)发现了北平图书馆藏的一份汉葡词典抄本,1934年即被费赖之(Louis Pfister, S. J.)在法文版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 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第二卷予以公布,文中将北平图书馆藏汉葡词典附录中的入华传教士名录以及中国修士名录书影登载在第二卷卷首,并在第996页的脚注中首次予以介绍:

在此标题下有一份手写名单,拉丁文和中文对照,有罗马注音,名单上是从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52)到恩格里(Christian Henriques, 1660)共77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名字。

传教士名单里有来华年份(欧洲纪年和中国六十甲子纪年)、原姓名和中文名、国籍、已逝者的埋葬地。

这份名单还给出了在南怀仁神父的书目(参看前言 pp. xxi, xxii)中没有收入的16名耶稣会助理修士的欧语名和中文名、国籍(14名澳门人和2名葡萄牙人)、埋葬地,没有来华时间。

这份名单最近(1933年)被伯纳德神父(Henry Bernard, S. J., 1889-1975)和布兰德神父(Van der Brand, C. M.)发现,作为附录收在一部32开本8+624+34页的汉葡词典中。这部手稿汉葡词典没有标题、作者、日期(可能作于1660-1661)。这部词典原是意大利人G. Ros所有,被北平国家图书馆获取,编号为22.658。

[收稿日期] 2011-10-10

[作者简介] 杨慧玲,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词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

汉字明显是由一个欧洲人所写。^①

自此,这部藏于北平图书馆后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汉葡词典抄本屡被提及。迄今为止,裴化行、费赖之、杨福绵、金国平等国际学者都是根据国图藏汉葡词典的附录判断词典编写年代的,由于附录中收入的最后一名入华耶稣会传教士是于1660年入华的,据此,他们判断词典编写不晚于1660年,并由此对词典作者多有臆测。杨福绵甚至认为这部汉葡词典有可能是学者们苦苦寻觅的利玛窦编的汉葡词典,但是,从迟至1660年入华传教士名单推测,也有可能是耶稣会费奇观或者曾德昭的汉葡词典。

由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汉葡词典是一部抄本,而非原稿本,因此,德礼贤等人根据字迹判断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葡汉词典为利玛窦、罗明鉴所撰的甄别方法不适用于国图藏本。作为一个没有作者、没有编写时间的抄本,仅凭词典后的耶稣会传教士名单等附属材料,不足以作为判断汉葡词典抄本编写时间的确证。

围绕国图藏汉葡词典最重要问题就是:国图藏手稿汉葡词典是否为历史上所载利玛窦编纂的汉葡词典?唯有从词典内容入手确定手稿汉葡词典的编纂年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

利玛窦在《葡汉辞典》(约1583-1588)完成后不久,就在1588至1589年间,和精通音律的郭居静、华人修士钟鸣仁等人合编了一部汉葡词典,其目的是为了推广汉字注音方案。从注音方面考察,国图藏汉葡词典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汉字词目都有不止一个注音。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利玛窦强制性地要求其他耶稣会传教士使用这套注音方案。因此,从利玛窦去世直到1670年万济国开始编纂双语词典时期,无论是耶稣会还是多名我会编写的双语词典,其注音体系大致与《西儒耳目资》一致,注音方案仍然相当统一。正是如此,万济国才可以编纂一部没有汉字、仅有汉字注音的西班牙-汉语双语词典,也正因为有了相对统一的汉字注音方案,来华传教士中出现了一种以汉字注音代替汉字的著述新传统。国图藏手稿汉葡词典的注音非常纷杂,收入了多国语言对汉字的不同注音,由此可以判断,这部词典的著者不是耶稣会士,而且它的编纂年代距离利玛窦时期较远。

另一个判断依据是,国图藏汉葡词典的词目是按汉字部首笔画顺序排列的单个汉字,而耶稣会在明末编写的汉葡词典词目是既有汉字,也有词语和短语的混合体。《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汉语混乱的描述,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另一部手稿汉葡词典词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对于只有词(Word)观念的欧洲传教士,他们无法准确判断汉语的字、词和词组,因此无论在叙述汉语语言还是编纂词典时,都使用的是字、词、词组混合形式的词目。此外,马尼拉、巴达维亚等中国周边地区17世纪早期编写的汉外双语词典也是如此,都是字、词和词组混合形式的汉语词目。^②因此,从双语词典史发展的角度推断,北京国图藏的汉葡词典以单一汉字为词目的词典,肯定晚于罗马藏混合词目的手稿汉葡词典(陈绪伦推测约作于1625至1644年间)^③。

第三个证据是,被国际学者作为判断汉葡词典编写时间依据的这份从1581年来华的耶稣会士沙勿略起至1660年入华的77名基督教传教士名录中,不全是耶稣会士。绝大多数耶稣会士名前都标注了“+”符号,多名我会传教士名字前有“D”,其余未标符号的人名部分是入华耶稣会士,也有方济各会传教士等。其中,卫匡国、南怀仁、潘国光、白乃心等一些著名耶稣会士名字前竟然没有标注耶稣会标识,这与严格排外的耶稣会一贯作风不符,亦不可能是耶稣会士的疏漏。

(下转第123页)

① 译自法文原文,中文版《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第1068页没有翻译此条注脚。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Tome II, CHANG-HAI, 1934, 第992页。

② 杨慧玲《世界汉外双语词典史的缘起》,《辞书研究》2011年第2期《耶稣会档案馆藏汉葡辞典研究》,《国际汉学》第23期。

③ 陈绪伦(Albert Chau):《罗马耶稣会档案处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举要》, M. E. Sharp, 1998。陈绪伦认为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编号为 Japonica-Sinica IV 7 的汉葡辞典可能是耶稣会的费奇观或曾德昭的汉葡词典。

研究。清华大学彭刚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历史理性与历史感》。他认为,在史学实践的范围内,历史感是历史理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史学理论应当关注史学实践,以反思史学实践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密切考察史学实践中历史学家历史理性和历史感的丰富而多样的体现,是史学理论对其达到更为深入的理论认识的前提。复旦大学周兵副教授结合国外史学前沿的发展现状,就数字史学在史料收集、史料保存、历史表现、历史传播等四个方面,回顾和展望了数字史学的发展,分析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呼吁中国尽快从历史学界开始,重视数字史学的研究和规范,从而进行数字史学的实践。

在易宁教授主持下,王记录教授和徐松岩教授分别对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会议讨论情况作了精要点评,北京师范大学周文玖教授对会议作了总结发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致闭幕词。杨院长在闭幕词中指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很多前辈学者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孜孜不倦,生命不止,事业不休,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大特色。这些前辈学者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作为在该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将继续为该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通过研讨,与会学者深切地感到,近十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队伍扩大,成果丰富,学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论文写作模式、思维方式以及选题侧重点、史料的发掘和运用,与过去相比,都出现许多变化。成绩固然可喜,但也有问题不得不引起注意,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研究包括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碎片化”。对这种现象或学术趋势,史学界认识不一,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看法。此外,在学术史乃至史学史的研究中,脱离历史环境孤立地考察学术现象,就学术论学术的情况也有所增多。在这种情形下,召开题为“历史·史学·社会”的学术研讨会,对增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旨趣,正确把握新时代历史研究的根本方向,自觉意识到一位史学工作者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及史学研究中切实贯彻历史主义原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研讨会,内容充实,气氛热烈。与会学者交流了思想,增进了友谊,解决了疑惑,明确了认识。大家一致反映收获良多。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责任编辑 周文玖)

(上接第119页)

综上所述,笔者可以推断:国图藏汉葡词典抄本是由非耶稣会士编写的、约在1660-1661年间完成的一部汉葡词典。

国家图书馆藏汉葡词典抄本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二:一是词典后作为附录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中外文名录和中国修士名录提供了当时在华传教士的重要信息,如入华年份、使用中文姓字号、在华驻地、国籍等。费赖之著、冯承钧译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就利用了这份文献,补正在华传教士信息。然而,最为罕见的中国修士的信息,多数中国修士名未被《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和书目》收入。这些曾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却被历史忽略的人物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二是汉葡手稿辞典对专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部独特的汉葡词典抄本记录的明清语言实际读音对汉语史研究、词条中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解释等对文化史研究都有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 易宁)